

理，惟已经出动的军队有骑虎之势，诸多越轨，实感遗憾，且无任惶恐。

(中略)下午4时左右，若槻首相拜谒，上奏内阁决议主旨。

下午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谒，秘密上奏：请求追认允许派遣朝鲜军的混成旅团越境问题。拜受陛下御旨：本次不得已予以追认，今后应多加注意。

以此，从朝鲜增兵问题虽合法解决，朝鲜军司令官独断专行及参谋总长管束不力等责任问题待时局平静后，需审议追究。

天皇陛下通过奈良，传达命令给金谷参谋总长：对满洲事变扩大事态始终是反对的。

这天的内阁会议，虽不赞成朝鲜军独断越境，但结果承认了增兵事实，也决定支出经费。若槻首相将这一内阁决议上奏。

这一来，天皇陛下下达了批准令，给独断越境合法化开了端。但是天皇陛下忧虑事态的发展，提醒金谷参谋总长今后决不能再做此类事情。结果，若槻内阁被既成事实所推动。内阁的追认使陆军和关东军增强了信心，加剧了扩大满洲事变的势头。

(摘自《皇帝的密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

林久治郎 原著

张德良 译注

译者的话：林久治郎于明治39年10月，经外交官和领事官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写于1932年至1935年期间。林久治郎死于1964年，死后13年遗著在日本出版。本译文系《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一书的第十四章“柳条沟事件”。

本文对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指挥柳条湖事件、封闭柳条湖爆破铁路现场，及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开城门迎敌的情况，均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林久治郎主张一元外交论，即由外务省及其派出机关主管外交事宜；反对双重外交论，即除外务省及其派出机关外，陆军特务机关不干预政治办理外交。他给币原外相的三封密电，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起了某种抑制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冒险的侵华战争。由此看出，多头政治、双重外交，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一个特点，只要日本侵略者不停止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步伐，这个弊端就不会改正。

柳条沟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我在津久居平吉老先生家过夜。因为他是我的一位同乡好友，又是在满洲培育果树的恩人，此刻他逝世了，我去他家守灵。根据死者生前留下的遗言，不由僧侣念佛经而代之以“清元节调”来供养。生前友好大都来了，我也置身其中。正当听到“清元节调”最高潮的时候，时间约10时半，从官署打来电话，敦促我急速回领事馆。因为正赶上“清元节调”最高潮的时候，等了大约10分钟告一段落之后，我才踏上了归途。当我从驻地军队门前通过时，忘记是谁向我报告说：“现今在北大营附近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目前正处于会战中！”我在这里才开始听到柳条沟事件（按：应为柳条湖事件）

的消息。回到住宅，马上就知道全体馆员和全体警察署成员早已动员起来了。我又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事实真相。根据特务机关的报告，当夜10时半左右，在柳条沟附近的满铁线路被爆破，那时正值被在夜间演习中的第二独立守备大队士兵看见，马上追击犯人，犯人向北大营的方向逃匿。在追击遭到了犯人从高粱地里的射击，由此遂开始了战斗。目前向北大营进击中^①，据此报告，我们想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不料，这时，第二十九联队也出动，开始向奉天省城进击。今春以来秘密安装在我兵营内的4门24厘米重炮，于11时刚过，开始向北大营和东门外的飞机场射击。隆隆的炮声震向四方。我军的行动，迅雷不及掩耳，使得中国方面，来不及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奉天省长公署向总领事馆申明，中国方面官民均无抵抗之意，因此请求我军停止攻击，从午后11时许（注：23时）奉天城遭受攻击。到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奉天城被占领为止，这期间，奉天省长公署不间断地以电话委托领事馆转告关东军停止军事行动。到了午前3时左右，中国方面打开城门，通知没有抵抗我军之意。

当天夜里碰巧正是星期五，在奉天俱乐部开舞会，多数侨民都聚集在那里。满洲事变爆发当时，舞会刚开始不久。俱乐部所在地，靠近各国领事馆，位于商埠中心和交通要道，作为观战的场所是一个适宜之地，自然也是危险之地。各国领事，尽管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们还是为本国侨民能否安全来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请求保护。此时，恰值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玛依雅斯回国度假，看家的领事托马斯又去了葫芦岛。副领事林

^① 柳条湖事件为日军在沈阳近郊柳条湖村附近，自毁南满铁路的阴谋事件，与中国军队无涉。这里说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而编造的谎言。

钦在家，几次到我总领事馆办事处，登门责问，他愤愤不平，牢骚满腹。

在满洲的日中关系，不易调节，以致引起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这不可避免的冲突，如何展开交涉方能对我方有利，外交机关则负有重大责任。这好比治病，由于误用了药而中毒，就有生命危险一样，外交工作出现差错，也将给国家的未来留下隐患。就个人关系来讲，没有社会各方面的协作思想，事情是办不成功的。就国际关系面论，没有舆论的支持去企求成功，也是困难的。如日清（注：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两次大战，当时为了同横暴的中国作战以及从自卫出发同俄国作战，除了怀有野心的二三个欧洲国家另作别论外，国际舆论大体上对我国有利。我国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取胜，而且还能在战后实现经营占领地，不能不说是依赖于舆论的支持。在此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把它叫做舆论战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德国方面，在整个4年里，尽管它在战场上始终占着优势地位，但战争的结局，还是无可奈何地宣告了无条件投降，这是因为世界舆论不站在它那一边的缘故。满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国运兴衰攸关的大问题，所以才被人们称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在满洲发生的日中冲突，如何使之向有利于国际交涉方向发展，对于我国实有绝对之必要，因此必须从今日起加速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关于这一点我同币原外相多次建议过，向老前辈和同僚们说服过，同一部分军人也交谈过。可是，动不动就想急于求成的中央军部，不能不走上轻举妄动的道路。特别是对于关东军的干部，我曾试图说服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满洲问题的解决，不仅国际关系重大，而且必须考虑到满洲居民的人心得失。为此，平时就要做好舆论准备工作。

去秋以来，当牵涉到铁路交涉时，日本内地逐渐兴起了对

华强硬论。本年入夏以来，以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契机，军部的活动逐渐表面化。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中央要员到地方上的师团长、联队长为止，公开发表有关政治、外交意见，或广为散发宣传小册子，违背了军人敕谕中关于“军人不得参与政治”的诏敕规定。他们无视政府，丝毫不去顾及在满洲采取行动将会引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后果。而因循守旧、姑息养奸的政府当局诸公，又不敢加以管束，遗憾的是终于导致了满洲事变的爆发。因为事先早有计划，所以我军进兵神速。我曾为停止军事行动全力倾注，但是，如箭离弦无法复归。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的当天，板垣参谋为了解决日中关系前来奉天，呆在特务机关。尽管我有时派领事，有时通电话，讲明事理，劝告板垣停止军事行动，可是关东军方面，一旦果断行动起来，伴随着隆隆的炮声，神经兴奋起来的军部，想要制止他们已经不可能了。事态发展到了第二天黎明，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竟然一发不可遏止。我除了注意使之在国际方面避免出现过失之外，已无挽救之策。

事实已经证明，关东军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在当地已无法制止，他们的行动业已超越我国政府大政方针所允许的限度，这时，政府应该出面加以制止才对。所以满洲事变爆发伊始，我每时每刻都把事态的发展电告给东京政府。象过去把抚顺会议（注：9月14日驻抚顺日军召开警备会议，确定了进攻沈阳的任务和进军的路线）情况电告给东京政府一样，只要不误公事，我宁可自己受到别人的轻蔑，也不悔恨。因此，虽为时已晚，我还是电告给了东京政府，以求防止事态的扩大。（注：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给东京政府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拍发过三封密电。9月15日就抚顺会议情况拍发的第一封密电电文是：“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并携带有弹药物资，

近期有采取军事行动之趋势。”9月19日黎明就“九·一八”事变爆发拍发的第二封第623号加急绝密密码电报电文是：“据报参谋本部建川部长，18日午后1时乘火车进入当地，军方虽系秘密安置，但我认为以上情况属实。另据满铁木村理事密报所传为中国方面破坏之地段，满铁为了修理曾派遣养路工人，可是军方之旨趣是不许接近现场。所以可以想象此次事件完全是出于军部有计划的行动。”紧接着拍发的第三封第624号密电电文是：“中国方面已数次建议圆满解决此次事件，本官用电话通知板垣参谋说：‘日中两国不仅未进入正式交战状态，而且中国方面而已声明完全以不抵抗主义为宗旨。此刻至为重要之点在于应努力使事件勿作不必要之扩大，并希望经由外交机关来处理此次事件。’可是板垣参谋回答说：‘此次事件关系到国家及军队之威信，也是为了尽保护在国外的日本侨民之义务，中国军队既然对我军加以攻击，我军就必须彻底地干下去！这就是我军的方针。’因为看不出军方有允准的动向，所以本官不得不将前述旨趣，多次唤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北大营当时有以王以哲为旅长的第七旅驻军。中国军队一方面为我军的突然击袭所惊呆，另一方面还得执行上级不抵抗和撤退的命令，所以被我仅有600人的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所驱散。拂晓，北大营即为我完全占领。向着奉天城内进军的第二十九联队，途中反复扫荡中国警察，于午前4时左右进入城内，这里也是天未亮就完全占领。与此同时，在长春也开始攻击了南门外（按：应为长春南岭）的中国兵营，其中一部分立即投降，余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19日午前激战之后，到中午稍前即平定。为此，我将士也付出了190人的伤亡代价。

在满洲事变爆发的同时，满铁方面认为有必要修理被炸毁了了的线路，准备派遣技师立即到现场去，可是未被关东军允许。

直到第二天早晨6时才允许进入现场。满洲事变爆发的场所，离北大营不远。当着该地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时，调查满铁线路破坏的地方加以修理，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直到6点前还不允许进入，这是因为关东军怕引起有关单位的怀疑，从旁插手。

驻辽阳第二师团司令部，19日黎明到达奉天。关东军司令官午前11时率领幕僚自旅顺到达奉天。尚未到正午，我在火车站拜访了司令官，和司令部人员同车一起到指定地点东拓支店，毫无顾忌地交换了意见。司令官照例用温和的口气，快速的谈吐，反复申明说：“在柳条沟附近爆破铁路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为，兼之又遭到中国军队频繁地顽强的抵抗，况且我军是遭受突然袭击，并非出自任何有计划的行为。”我向他说：“现在能否返回到事变未发生之前状态中去。考虑到国际关系，事态不能再行扩大，有必要尽可能早些结束。”我还向他说了抚顺会议有关事件，并请他注意来自外部的种种猜测，以及由此容易引起的社会惊恐与不安。

本庄将军调任关东军司令官仅仅14天。按照军部的传统，象满洲事变这样的计划是全体幕僚的工作范围，准备工作司令官有许多事情不一定知道。大体上的安排，不用说应该是知道的，至于具体的计划司令官是否真的知道值得怀疑。根据调查所得，在这之前，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少将身着便服乘坐安奉线快车，于18日午后1时抵达奉天，隐居在某一小旅店。等他拿出主意来已是天明时分了。建川少将是1929年8月，由北京公使馆武官转任第二部长的。此次抵达奉天的时候，我向他说明了军部玩弄阴谋的过错。并警告他说，各机关不能保持步调一致，坚持到底，是很难期望取得完全成功的。建川在参谋本部，执青年将校之牛耳，故敢于坚决执行此次大事，发动了

满洲事变。在建川抑郁阴沉的脸谱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胆妄为的气质。他和关东军参谋石原中佐一起，是此次满洲事变的核心人物。

遵从我军预先准备好了的战时计划，长春、营口及其他满铁沿线的主要地区点在19日内完全占领。入夜，将驻在鸭绿江对岸新义州附近的驻朝鲜日军第二十师团中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令其做好整備，立即进入满洲。

20日，第二师团除第二十九联队留驻奉天外，全部进入长春。多门二郎师团长也于同一天到达长春。为了第二天黎明进入吉林，责成满铁职工，做好吉长线军事运输的准备工作。

当时，在满洲的我驻守部队，第二师团有5 000至6 000人，独立守备队有6个大队不超过5 000人。当军事行动发展到进军吉林的时候，自然要产生兵力不足的问题，作为后备力量，林銑十郎司令官率领下的驻朝鲜日军的一部，支援满洲，乃是预定的计划。

关东军出动到满铁沿线以外，或者驻朝鲜日军派往满洲，平时并不属于关东军司令官的职权范围，只有奉行天皇敕命，方可实行。当时军部派出机构既然已有无视政府的意向，超越了职权范围去发动满洲事变，这就势必要负违敕之责。我殷切希望满洲事变不要扩大到满铁沿线以外去，并立即向政府报告，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事态就会延伸到吉林去，驻朝鲜日军也势必进入满洲，以此提请政府注意。根据转告得知，19日午前9时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讨论处理善后问题，议定事态不扩大方针。在内阁官员中，首相、外相并不是策划满洲事变的核心人物，但他们也没有和陆相一起，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制止满洲事变的发生。

开往吉林的临时加车，还在20日夜列车既已编组完毕，做

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惟当夜未下令开车。到21日黎明，好不容易关东军司令官才发令。午前10时左右，从长春发车。在多门师团长指挥之下，第十六旅团在同一天午后3时刚过，到达吉林。代理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职务的参谋长熙洽，原先就没有抵抗我军之意，到途中去迎接，并与多门中将一起，到了名古屋馆。经过磋商，采取和平方法。吉林的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旧吉林省政府解体了，新政府组织起来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军在吉林未经流血，即开入城内，并使吉林出现了万象更新的气象。

关于进军吉林，本庄司令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对于幕僚的建议并没有马上答应。从20日午后8时起的长时间里，在幕僚们强硬的建议下，司令官才算同意，并于第二天午前3时下令攻打吉林。

19日在新义州集中待命的第三十九旅团，曾制定了在进入满洲的同时，出兵吉林的计划。由于受中央军部指示的限制，20日才没有能够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关东军司令部的幕僚们对于外交机关的干扰，非常愤慨，终于在21日擅自渡江，深夜到达奉天。

关东军本来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一味地反对外交派出机关。关东军的行动都是这样干起来的。至于司令官的内心想法，当另作别论。

军方对我领事馆，没有任何照会，甚至也不联系。他们这样做，是怕妨碍军方的行动，所以对总领事馆势必存在戒心。然而，从大局着眼，譬如说，既已挑起军事行动，损害我国利益，又比原来事态扩大，对此不容许视而不见。为了使事态不致于再恶化，先得着手于善后处置。在可能的范围内，找到一个对未来有利的问题解决的方案，这是派出外交机关的义务。我们一方面将实情及时地报告给政府，以便采取切合时宜的措置；同

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同军方的联系；在国际方面，力求尽量减少出现过错。当时的政府为意外发生的事件所震惊，为使事态不扩大，可以想象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无论以币原外相的思想来说，还是以南陆相的人格来说，他们都为限制事件的扩大克尽诚意，但优柔寡断的政府没有能够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

军部的轻举妄动，对国家的将来有酿成严重灾祸之虞。在欧洲大战中，我在山东任职时，就已痛切地感受到，政府当局如不狠下决心，就无法纠正军部的轻举妄动。1919年凡尔赛和平会议时，日中关系发生了纠纷，关系到我国政府的方针和态度。那时不要说一般民众不满，就连青年外交官的不满呼声也很高。他们在霞关（注：外务省所在地）组成了革新同志会。那时，我向同僚们说：“重要的不是制度的革新，而是思想革新和精神的确立。欲想对外强硬，先要对内明确承认外务省的存在，树立自己的主义，采取自己的方针。对于一切阻挠此种行为的障碍，必须果断地加以排除。历来的日中关系之所以不能按照设想进行，乃是所谓‘双重外交’酿成的恶果。因为外务省常常持消极态度，而使持积极态度的军部，从旁无视并蹂躏外务省。因而，欲图使我外交革新，第一要义是振奋外交官的精神状态，采取自主积极的态度。至于制度的革新，不过是为思想革新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而已。”我用这些主张，努力地去说服周围的人们。不幸的是在当时还没为大多数的同僚所理解。尔后，日中关系日益复杂困难，外交机关的责任也随之日趋重大，可是上述的状况，仍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陆军方面，驻中国的日军所在要地，都设置有特务机关。在这里任职的是陆军大学出身的，称王称霸的，年轻有为的将校。特别是在重要地点，都由军部内的优秀人员驻扎该地。不用说他们要进行军事上的研究，就连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也不放过。

此等驻扎人员的训练工作和任务分配，都由参谋本部直接管理。有事之秋，就是执行机关；平时以搜集情报为主及布置种种研究课题，令其回答。其中对政情报告以及献计献策尤为重视。如何才能使事态向有利于我国方向发展？当代中国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如何来利用？就此类问题，每年都要提出意见。这种工作，中央军部方面也同样要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

此等特务机关的所在地，原来大部分都是有领事馆的地方。虽然说有外务省的现职人员在那里，但陆军方面的特务机关的人选标准，同外务省则大异其趣。他们是由军部内部的最优秀分子充任其职。其实，极而言之，也不过就是任用以普通方法培养成的学习过中国话的人员，和外交官的选拔怎能相比。外交官，须经过考试及第，才能出任，其中成绩优秀者一般地都被派往欧美，留到中国的，都要抱怨自己是怀才不遇者。霞关（注：指外务省）对特务机关的这一切，几乎漠不关心。

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特务机关一方，可以有很多经费供开支，外务省派出机关一方，仅仅限于领取法定的有限的经费供开支。因此，在机构设置上，人选上，要想振兴我正当外交，压制军部的横暴，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实际上霞关有没有压制军部矫正双重外交之意，并将其贯彻到底的决心，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满洲事变爆发之后，政府竟然束手无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满洲各地的领事，对军事行动的结果，自然不能发挥外交的职能作用，而且由于军部对外交机关有反感，使各地同僚陷入了非常困苦的境地。我向我的同僚们说：“隐忍自重吧，设法避开和军方的冲突，但要注意报告满洲事变的真相，勿稍懈怠。另一方面政府对满洲事变可说是优柔寡断的。作为为我国的当政者，我国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对于采取无视现政府的

行动，又不能加以控制，应当引咎辞职。当然对最高当局来说，应当立即控制派出机关的行动，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是不断地提出强烈的建议，遗憾的是我国政界缺乏得力人士，丧失了对满洲事变爆发后的善处之机，遂导致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变。

当时，外务省几乎不知道满洲事变所发生的事情。19日外务省派亚洲局第一课长守岛伍郎书记官前往满洲，22日到达奉天。我以为他一定是衔有重要使命来的呢！哪里想到什么特别使命也没有，只是说：“来这里看看。”值此重大时机，作为亚洲局活动中心的课长先生，竟然什么使命也没有，如此漫不经心地出差在外，不得不使人怀疑上级机关的起码工作常识。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当时是处在怎样的一种窘境。我向守岛课长说：“既然你特意来到此地，那么你就在现场做一点制止的事吧，以表明中央政府尚且存在，用以实现对政府下级机关的控制。统制是金科玉律，关系到我国荣誉所在，对我军统制的混乱现象，不容复活，何况，满洲事变是我国空前的一大紧急事件，一刻也容不得动摇不定。政府当局人士应当立即明确职责所在。你应速归，将此宗旨转告给外相。”非常爱激动的守岛先生，怀着沉痛的心情，几乎一言未发，对我所说的一切，均表示谅解。第二天赴大连，会见满铁总裁内田伯爵，第三天乘飞机踏上返回东京的途程。

中国方面本来就没有武力抵抗外来进攻的能力。他们的传统作法是“以夷治夷”。国际联盟理事会此时正值开会中。21日，根据联盟规约第十一条，中国向理事会申诉要求处理满洲事变，时时刻刻都在往日内瓦呈送情报。我国政府，由于是突然事变，同时又是国内机关失于统制而挑起的事变。因此，首先需要在我国内部加以统制，同时派出军部和中央军部又缺乏完全一致

的步调，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处置。由于这样，当初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上处理本案时，我方的态度不够明朗，虽属遗憾，但也是出于不得已。

政府在初期，丝毫没有打算扩大事态，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在内阁会议上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向国际联盟、向美国、向一切方面，都发表了同一旨趣的声明。然而，军事行动迅速扩大了，不要说满铁沿线，进而出兵吉林、郑家屯。到了24日，大有出兵哈尔滨之势。不过在事实上，在满铁方面，他们忧虑在长春能否迫使中东铁路职工强制运行，因为多数列车员都取观望态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出发的准备尚无把握；再说第二师团出兵吉林行动告一段落之时，大部分都返回了长春，没有新的行动准备；此时又有政府不准出兵哈尔滨的严峻命令，所以没有能够实现。在军部幕僚中，对派出外交机关的干扰，表示愤慨者，颇不乏其人。

通过在联盟理事会上的对美交涉，政府极力牵制军部。9月下旬，调兵至洮南及通辽一带的军队也退回到郑家屯。这样，总算使军部发热的头脑，稍稍冷静下来，或是给人以军部回到了正确轨道上来的观感，以此向联盟理事会保证，我政府对满洲事变采取不扩大方针。9月30日理事会作了九条决议，决议中未从正面反对日军的军事行动，对我军撤回附属地也未加反对，但撤兵的条件是必须保障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译自〔日〕林久治郎：《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1978年原书房版，第115页至126页。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